

中国现代卷

第一卷

上

小说

鉴赏

文库

王瑶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小说鉴赏文库

• 中国现代卷

• 第一卷·上

王 瑶

李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

• 小说鉴赏文库

• 中国现代卷

• 第一卷·下

王 瑶
陕西人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编委会

主 编：王 瑶

副主编：刁汝钧

顾 问：李何林 单演义

执行编委：宋建元 蒋树铭 沙作洪 党秀臣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刁汝钧 王 瑶 吕世民 江宏基

宋建元 沙作洪 周 健 张 华

党秀臣 蒋树铭 雷 敢 黎 风

小说鉴赏文库
中国现代卷

第一卷（上、下）

王 瑶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28.625印张 5插页 638,100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900

统一书号：10094·595 定价：（平）6.20元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

卷前说明

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小说，开创了中国小说发展历史的新纪元。总结历史经验，探讨“五四”以来至建国这一时期不同流派作家的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对于当前大学文科学生、广大文学爱好者增长文学知识，开拓眼界，提高作品欣赏能力，陶冶情操，丰富精神生活；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有积极的作用。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依据上述目的，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坚持党的“双百”方针，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尊重文学发展规律，对“五四”以来，或起开创作用、或有较大影响、或具有代表意义的不同流派、风格的作家作品予以选录；每篇作品后面缀以鉴赏文章，事实求是地对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和分析。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分三卷出版：第一卷（上、下），“五四”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8—1927）；第二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第三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年）。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的编写，得到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

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等单位的支持；从选目到编辑，又得到全国各地专家同行的热情指导，我们深表谢意。本书的疏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指正。

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部

前 言

中国现代小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随着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进展，逐渐地成长壮大起来的。它的成长史虽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一条曲折的极不平坦的征途。从先驱者们所留下的足迹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有他们辛勤跋涉的艰苦，创造探索的欣喜，前进路上的苦闷和徬徨，也有坚韧不拔的奋战与搏斗。道路确实是曲折而不平坦的。但它前进的总趋势，却始终依循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航道，由涓涓细流，而汇为奔腾的江河。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战线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一些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意识到：政权革命代替不了社会革命，要拯救祖国，还必须开展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于是，他们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猛烈地向封建营垒冲击：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从而揭开了中

国文学史上崭新的一页。

这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斗争。它既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政治、思想、文化的新的改革的强烈愿望，也表现了它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热烈响应。它是在中国深厚的文化沃土中萌发的，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领导下产生的，这就使它具有了新的性质，成为新兴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出现，历史地结束了我国旧文学停滞不前的落后状态，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的一次重大革新，也是中国文学跃入世界进步文学行列的“现代化”的起点。

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七年约十年间，是中国现代小说蹒跚学步的第一个阶段。鲁迅是它的第一个开拓者，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其内容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和《阿Q正传》等篇，“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①，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健康发展，铺下了第一块基石。鲁迅在思想、理论上、生活上、技巧上的成熟高度，在当时犹如奇峰突起，他自觉地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将令”，以小说为武器，要“改良社会”，“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所以一开始就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

一九一九年元月，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成立的“新潮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崛起的第一个文艺社团。他们追随鲁迅，使新小说的创作发出了回响。从内容看，他们基本上与鲁迅取

①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②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同一步调，是“有所为”而发的；在艺术表现方面，虽显得平淡幼稚，留有“旧小说的写法和语调”，散文化的痕迹也相当明显。本书选录的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杨振声的《渔家》、汪敬熙的《瘸子王二的驴》就是这一社团的代表之作。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在当时有其一定的艺术价值。

一九二一年一月，茅盾、叶绍钧、王统照等人，在北京创建了“文学研究会”。同年七月，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等人成立了“创造社”。此后不久，其它文学社团如“沉钟社”、“语丝社”、“莽原社”、“浅草社”、“弥洒社”等，也如雨后天春笋般的破土而出，小说创作的数量迅速增长。作品选材也日益扩大，作者们开始跨出学校生活和个人恋爱私情的狭小天地，逐渐走向社会。

在众多的文学社团中，就其创作倾向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写实派”，他们沿着鲁迅的步伐，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①，后来被人称为“人生派”。一是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艺术派”，他们崇尚“美的追求”，要求“尊重主观”，富有浪漫主义的气质和倾向。

文学研究会在当时影响很大，许多作者从各自不同的经历与认识水平出发，执着地探索社会和人生，有些作品被人们称为“问题小说”。冰心的《超人》主张人生是“爱”，庐隐的《海滨故人》透露出人生是“憎”，叶绍钧善写灰色的小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潘先生在难中》就批判了他们“活

①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着就是人生”的处世哲学。王统照认为人生的追求应是美与爱，落花生却在美与爱里，掺和着随遇而安的“退婴意识”，《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就是他所塑造的与世无争的典型。此外如朱自清的《别》、利民的《三天劳工的自述》、徐玉诺的《一只破鞋》、王思玷的《偏枯》等，都从不同角度，试图寻求人生的真谛，然而却苦于开不出疗救社会痼疾的理想“药方”。

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大都是留日学生，他们身处异域，深感弱国子民的屈辱地位，常常萌发缅怀祖国的激愤。在文艺思想方面，也由于长期寓居海外深受世界各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常伴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情调和比较明晰的反帝意识。郁达夫的《沉沦》可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它通过一个“时代病”患者的忧郁和幻灭，暴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给青年一代带来的种种重压和精神磨难。他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带有苦闷、彷徨、孤独、颓废，以至堕入自戕的烙印，这是历史性悲剧的病态反映。王以仁的《流浪》和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也都或多或少地留有这方面的影响。

此外，在上海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如上面提到的“弥洒社”“浅草社”等，他们或者“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或者“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①。胡山源的《睡》林如稷的《将过去》即其代表。

^①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除上述社会文学，感伤文学盛极一时之外，“乡土文学”的勃起，也是当时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它的艺术特征是作家描绘各种风俗民情画，以表达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对人生的看法。它基本上与写实派的文艺倾向相一致，只是它用强烈的乡土气息，显示出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力量。许钦文的《疯妇》、鲁彦的《黄金》富有浙东的泥土味，黎锦明的《出阁》，展现了湘中婚嫁的民俗。许杰的《惨雾》、彭家煌的《怂恿》，或揭示浙江农民在宗法思想支配下的原始性械斗，或描述善良而愚弱的农家夫妇，受地主播弄，演出的一场悲喜剧。此外，还有台静农的《拜堂》、王统照的《沉船》、冯文炳的《竹林的故事》、高世华的《沉自己的船》、魏金枝的《留下镇上的黄昏》等，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给人以“真气扑鼻”的艺术感受。

当然这些仅是大概的区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中不免带有自然主义的成分，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中，包含着对表现派，未来派的借鉴。就是同一社团中，其情况也差异不等。文学研究会中某些作家的作品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创造社中的张资平就很少浪漫气质，他的《木马》，风格更近于写实，表现了客观摹写的艺术倾向。

当然各文学流派独特的艺术风格，是作家们共同的艺术修养、欣赏习惯和美学趣味的综合反映，但更主要地还取决于他们的社会思想和对人生的态度。现代小说流派分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壤之中，不可能不表示出作家们“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的关心”。因而，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是“社会的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时代儿”^①，都表露出强烈的时代感。“五四

^①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巨浪冲刷着旧世界的一切，爱国忧民的文学家决不会是巨浪之外的旁观者。虽然有些人后来落伍了，但更多的人却不断克服着本身的弱点，随着奔腾的时代激流在前进。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小说幼年期所形成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流派，不象西欧那样泾渭分明，脉络清楚。他们是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又各带着自身的特点。总的看来，现实主义所取得的成绩显得更加辉煌一些。

“五四”时期是一个创新时期，新的思想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表现形式。在文学革命中，白话文的提倡和普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性突破，它体现了文学要与人民保持紧密联系的时代要求。“五四”新小说是白话文学中的“重炮手”。鲁迅的小说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为它树立了楷模，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提供了榜样。他在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基础上，大胆地借鉴并汲取那些适应我国民主革命需要的近代外国小说的艺术精华，从而突破了我国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的框子，形成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二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建立了黑暗的反动统治，国内阶级斗争发生了强烈的变化。中国革命进入了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以农村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另一方面是党领导下的“农村革命斗争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作为这

一时期新文艺运动深入发展的标志，就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左翼十年”。在党的领导下，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作家投入了实际革命斗争，鲜明地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以共产主义者鲁迅为主将，组成革命文学的强大阵营。他们在反动派的高压下顽强地生长，在反革命“围剿”中傲然挺进，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①。不少进步作家和爱国作家，也在严酷的斗争面前，认识到民族苦难的根源，扩大了生活的视野，他们的创作更紧密地与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倾向更加鲜明。文艺创作的影响也从知识分子群中逐渐扩大到工农中去，新文艺运动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斗争中，艰苦顽强地向前发展。

这十年的小说创作，较之“五四”后的十年，有新的发展：在作品的主题上不断深化，表现出与革命斗争结合的自觉性。有的直接歌颂土地革命，描写武装斗争；有的深入挖掘人民受难的社会根源，表现他们的革命觉醒，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和思想更为鲜明突出，写出了时代的血泪，也写出了反抗的怒吼。作品的题材上也更加丰富多样。农村题材，抗日题材大量涌现，三十年代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在作品中得到了表现。同时在艺术技巧上也有明显的提高，这都标志着中国现代新小说的创作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小说创作中，头十年里几乎没有长篇，这时期却产生了不少巨幅画卷。被誉为“扛鼎”之作的《倪焕之》，是叶绍钧

^①鲁迅：《黑暗中的文艺界现状》。

一九二九年的作品，它反映了从“五四”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这一时期的时代面貌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①的思想演变。小说承继了作者过去严谨朴素的风格和冷静谛视人生的态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更为深刻强烈。作品描写的不再是小市民的浑浑噩噩，而是一群追随时代浪潮探求进取的知识分子，它表明了作者自己对前途充满了希望。

就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社会效果来看，我们必须提到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和老舍的《骆驼祥子》，它们都是这一时期长篇小说重大成就的标志。

二十年代初提倡“为人生”的“写实主义”代表作家茅盾，这时在革命斗争的锻炼中，思想境界不断提高，生活和艺术视野不断开拓，他从探索人生进而去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他相继写出了《蚀》、《虹》、《三人行》等小说，又于一九三二写出了长篇《子夜》。这是继《呐喊》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重大发展和收获。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形象，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以严谨宏大的艺术结构，组织了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事件，这些事件又隐伏着中国社会的过去和未来，鲜明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反映出三十年代旧中国的社会面貌，指出了革命前景。

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写成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是他的成名之作。他以对时代激流执着的热忱和积郁心头的愤怒，揭露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它必然灭亡的命运，宣告

^①茅盾：《读〈倪焕之〉》。

了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小说塑造出一个冲出封建家庭，代表新生正义力量的知识青年——觉慧的新人物形象，并艺术地再现了“五四”时代不可阻挡的历史激流。

始终关注着城市市民生活，用含泪的微笑进行社会讽刺的老舍，经历了八年创作上的探索和锻炼，在一九三二年以后，随着他对祖国苦难的更多的认识，其创作有了大的进展。继一九三五年写出《月牙儿》之后，第二年又写成了《骆驼祥子》，这是现代文学中，反映城市贫民生活最成功的长篇小说。作品真实地记下了一个人力车夫在黑暗社会中为生活挣扎，而终于沦落的斑斑血泪，不仅表露了对“劳苦社会”的同情，对现实社会“地狱”似的人生的不平与控诉，而且批判了祥子的生活道路和抗争方式，显示出凝重沉郁的深思。

这一时期对小说的创作和发展起了重大影响的是关于“革命文学”的倡导。最先倡导它的是“普罗文学派”，时在一九二八年前后，主要是由“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倡导的。他们旗帜鲜明地强调文艺要为革命服务。艺术上更多地吸取苏联文学的养分。这给新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色彩，在题材上由“革命加恋爱”逐步过渡到正面描绘工农群众的武装斗争；作品的主人公也由知识分子转换为工农兵和革命者；作品的格调由沉闷伤感而趋向于明朗开阔。体现这个创作特色的有蒋光慈、洪灵菲、柔石、冯铿等。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写了一个朝鲜爱国者的国仇家恨，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民族的压迫，反帝的倾向是很鲜明的。洪灵菲的《在洪流中》不只写了农民的苦难，更通过革命与母爱的矛盾，写了他们的觉醒与抗争。柔石的作品多以青年对生活和社会的探求为题材。他的《二月》的主人公肖涧秋，就是一个想有所为，又不能跟着时

代大齿轮转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冯铿的《红的日记》则是直接描写苏区生活的可喜尝试。这些作家的艺术风格和作品成就虽各有不同，但总的说来他们是以强烈的革命色彩和激奋的热情，赞颂了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环境中，起了可贵的振奋斗志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大都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够熟悉，再加上当时政治上“左”倾思潮的影响，作品中往往是革命热情有余，生活实感不足，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较为明显，塑造的工农兵形象一般缺乏个性，对革命者的描写也大多是“罗漫蒂克”的。

在“左联”成立前，还有一批艺坛新秀，诸如一九二八年成立的“红黑社”。他们都有坎坷的漂泊经历，又有大致相同的艺术志趣，受俄、法批判现实主义影响较大。作品中擅长于人物的心理刻划和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他们选取的题材多是爱情生活，善于塑造女性形象。丁玲早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以内心独白的细腻笔法，写出了一个人“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①形象。反映出“五四”以后叛逆女性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苦闷，在无可奈何的伤感中，潜伏着一种寻求出路、追求光明的渴望。胡也频的小说也多以青年爱情为题材，诅咒人生的悲苦。如《北风里》就是这样的作品。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突出的特点是：一方面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转入广大农村，大片农村成为革命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将重重苦难沉重地压在农民

^①茅盾：《女作家丁玲》。

头上，农村更加凋蔽。因此反映农村生活，歌颂土地革命，描写武装斗争，就成为左翼文艺创作的显著特点。除老作家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这些名篇外，张天翼、沙汀、艾芜、蒋牧良、周文、叶紫等，也都是描写农村生活的新秀。张天翼用洗炼泼辣的笔墨，展现出地主阶级残害农民的血腥罪恶。艾芜把西南边境下层人民的苦难引入文学作品，打开了一个新的生活领域。沙汀把笔端转向他所熟悉的四川农村，含蓄深沉地描画出被压迫者的血泪和纯朴的心灵。蒋牧良的作品常常抓住生活片断写出尖锐的社会矛盾，具有深刻的讽刺力量。周文的小说多取材川、康边境的农村，文笔朴实细致，善于扑捉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但展示的社会画面不够广阔。

叶紫虽比上述作家出现稍晚，在描写农村阶级斗争上却是成就较大的。他的作品充满强烈的战斗精神，笔下的人物多是倔强地生活着，通过曲折艰辛的道路，大半走向了革命。如他的中篇《星》里的春梅姐，在经过艰苦的磨难后，终于“没有留恋，没有悲哀”，坚强地走向了“东方”。他的短篇集《丰收》就是一部充满火样热情和血泪现实的作品，写出了农民在被压迫的血泊中觉醒起来走向革命的历程。

吴组缃这时的笔锋对着破产中的皖南农村。他的《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等短篇，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揭示出深广的社会内容，真实地写出动乱中的农村现实。和他相似的还有罗淑。她的《生人妻》写得哀婉动人，文笔也清新朴素。

这些大量反映农村的作品，虽然地域不同，角度不一，但总起来却汇集成一幅农村破产和农民革命的时代画卷。它们在